

SHEHUIZHUYI

Neng gou Jiu
Zhong guo

社會主義
能够救中國

聞迪等著



D6/9

社會主義能够救中國

聞迪等著

社會主義能够救中國
華藝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市朝內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號)

(郵政編碼 100010)

世界知識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960 1/32 印張: 4.375 字數: 77 千字

印數: 00001—10000 冊

1990 年 2 月第一版 1990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039—334—5 / D · 62

000320

DI08/23

目 錄

社會主義能够救中國	
..... 聞迪	(1)
希望，就在這代青年人身上	
..... 紀濤、鞠紅	(39)
推薦一篇好文章和一篇好報道	
..... 人民日報編輯部	(45)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 (人民日報社論)	(47)
中國在五十年代怎樣選擇了社會主義	
..... 胡喬木	(53)
怎樣看待中國的“窮”	
..... 高狄	(63)
中國社會主義四十年	
..... 任國鈞	(78)
改革開放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	
..... 北京大學校長 吳樹青	(94)
對當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新現象的看法	
..... 張一	(118)
改革：資本主義化，還是社會主義	
的自我完善？	馬岩 (127)

社會主義能够救中國

聞 迪

內容提要

一. 中國正處在一個什麼樣的歷史時刻？

二. 社會主義在中國已經失敗了嗎？

三. 只有中共才能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

四. 社會主義民主建設也是一個過程

結束語

1989 年是這樣一個特殊的年頭：200 年前發生了對世界歷史進程具有深遠影響的法國大革命，50 年前爆發了給世界人民帶來極其沉重災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法國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理想之火，只有科學社會主義的奠基人才超越了它的局限性，提出了更高的社會變革的藍圖。爲什麼在世界資本主義占統治地位的小小星球上，在相距不過 20 來年的時間裏竟然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這無疑是值得一切善良的人民反復深思的問題。世界雖然正朝着緩和而不是冷戰的方向發展，但是有遠見的政治家却不能忘記從兩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中去總結出一些有

價值的教訓來。

不久以前，中國的一些自稱受到法國大革命和“五·四”運動精神啟迪的政治“精英”們，發動了一場旨在結束中國的社會主義、重建資本主義的運動。一時間，一些青年學生與社會人士紛紛走上街頭，騷亂不僅產生而且從北京向全國蔓延。打倒政府、打倒共產黨的口號已經出現，而且似乎有人正在為建立新政府奔走安排。中國向何處去成為一個緊迫的實際問題。中國真的需要一場改朝换代的大動亂嗎？一場大動亂會給中國帶來什麼樣的後果？正當人們為中國將來的發展憂慮的時候，中國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結束了這場騷亂。世界上沒有萬全之策，中國政府為了國家的穩定，採取了其他政府面臨同樣局面也不得不採取的措施。事情的結局並沒有按照那些政治“精英”們的預想發展，這就留給每一個不願看到中國再次陷入動亂的人們的一個深思的機會。

中國已經到了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了嗎？

中國需要一場改朝换代的大動亂嗎？

中國的社會主義已經失敗了嗎？

中國共產黨已經不能領導中國的建設和改革，到了必須被推翻的地步了嗎？

一句話，中國向何處去？這就是我們的問題。

這些問題對於一個仍處在社會變動時期的中國本來是難以避免的，它們就像幽靈一樣縈繞在人們、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心頭。

23年前，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在錯誤的領導和壞人的利用下，有過一場非常左傾的騷動；而近年來，不少大學生在政治“精英”們的帶領下，又有一場非常右傾的騷動。這兩種騷動或者說走極端，雖然都反映了青年人充滿民族憂慮的吶喊，但卻都不是他們已經相當成熟的表現。青年知識分子最令人欽佩的地方是他們對理想的執著追求，而他們的弱點則往往是缺乏嚴謹的科學的精神以及實現理想所必須的正確方法。

從古希臘的哲人柏拉圖起，自由就被認為是對規律的服從。而認識規律，在紛繁複雜的社會現象中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歷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都有各種不同的評說。法國大革命已經兩百年了，人們至今沒能找到統一的評價。不久前出現的這場風波，也會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國民黨方面給這場動亂以極高的贊美，認為是譜寫了“自由民主的新篇章”，大概是從中看見了“光復大陸”的希望。歷史的確往往比人們所能想象的更曲折、更復雜、更捉弄人。歷史又是開放的，一個歷史事件的影響有時要許多年以後才顯現出來。如果那些政治“精英”們推翻共產黨、重建資本主義的美夢得以實現，那麼整個中國的近現代史就該推倒重寫了。

讓我們轉過來討論前面的那些問題。如果在這些問題上不能形成共識，而又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來解決這些分歧，動亂就有可能再發生。

一.中國正處在一個什麼樣的歷史時刻？

政治“精英”們對形勢的估計是自相矛盾的。當他們以改革開放的參與者自居時，他們便大叫要保衛十年改革的成果，要防止有人把十年改革的成果毀於一旦，好像十年中取得的進步都是屬於他們似的。而一旦他們需要大學生的支持時，他們便描繪出一幅聳人聽聞的畫圖：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獨裁專制，官倒橫行；仁人志士飄流海外，忠臣良士盡陷冤獄；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如果那樣，又有什麼改革的成果可言？挾危言以欺人，似乎不聽他們的話，中華民族便會落到萬劫不復的地獄之中。這種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手法，實不足為訓。

讓我們來看看中國究竟處在一個什麼樣的歷史時刻？

早在 1971 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先生在堪薩斯城有一個著名的講話。他指出現在的世界存在着五個強大的世界經濟實體，那就是西歐、日本、中國，當然還有蘇聯和美國。“正是這五強將要決定經濟的前景，並且將以各種方式在本世紀的後 30 年中影響世界的未來，因為正是經濟力量是決定其他力量的關鍵。”尼克松大概是第一位認識到中國已經開始步入強國之林的美國總統。其實，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並不強，即使是在那基礎上又已經翻了兩番的今天，我們仍然不算太強。我們的強大在於這

些年中一直保持着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更高的發展速度，因而有希望趕上和超過之。尼克松先生當時無疑已經看出了這個趨勢。無論如何，這個趨勢一直保持著。

那些懷着一腔熱血走上街頭的爱國學生幾乎沒有不希望國家迅速發展的，政府與參加學潮的大多數人之間本沒有根本利害衝突。爲什麼事情發展到那樣難以收拾的地步，值得人們深思。我們中華民族在本世紀經歷的動亂之多，在世界史上是不多見的。自從清王朝被推翻以來，動亂或者戰爭連綿不斷，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國家才大致安定下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 40 年中，沒有戰亂，在人口倍增的情況下絕大多數人至少有了溫飽的生活，國力增強之快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中國人”這個稱號在共和國成立以前是沒有什麼榮光。老羅斯福總統就愛用“中國人”來指斥那些愚蠢、低能的人員。“中國人”這個稱號漸漸的有了點尊嚴，那是發生在朝鮮戰爭與中國爆炸了原子彈之後。美國人不能被低能兒所打敗，低能兒也不應該握有原子彈，這對那些主張優勝劣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是不言而喻的。倘若歷史能倒轉，讓那些學潮的領導者有機會接受老羅斯福的一次“賞賜”，或者讓他們有機會在南京街頭目睹兩個日本軍官各自一口氣殺掉 100 多中國老百姓的“比賽”，他們或許能够明白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誕生的那個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價值，而不至於那樣急不可耐地要用台灣

式的或美國式的共和國來取而代之。不論中國政府在它領導的 40 年中犯有多少錯誤，但這 40 年是中國獲得真正的獨立、統一和開始步入強國之林的 40 年，是中國人逐步爲自己贏得尊嚴的 40 年，也是中國人民的生活得到較大改善的 40 年。要推翻這樣一個政府是需要進行論證的，靠制造駭人聽聞的流言，最終不能成大事。

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是逐漸拉大的。在工業革命前，中國與它們的生產力水平相差極小。在 1750 到 1950 這兩百年間，人均國民經濟總值的差距幾乎擴大到近 100 倍。比如說，我國在 1952 年人均占有鋼鐵僅 2.5 公斤，到現在才剛剛超過 54 公斤，而美國 1920 年人均占有鋼鐵就達到 350 公斤。這種長時間積累而形成的差距，無法在短時間內消除。所以，從經濟水平來講，我們只能稱爲二等國家，或者說一個區域性大國。從生活來講，我們仍然屬於低收入國家。毛澤東主席早就提出要爭取摘掉一窮二白的帽子，看來這個願望至今還沒有完全實現。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的國家多麼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只有一個長時期穩定而又快速的發展，才能使我國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才有可能使我們再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最終建立起一個把世界上最新科技成果囊括其中的中國新文化圈，才能實現孫中山先生幾十年前發出的趕上西方人的宏願。只有到那時，我們才能心無芥蒂地爲作一個中國人而感到驕傲。可是，怎樣才能建立

一個長治久安的環境呢？這無疑是對中國人民以及他們的思想家與政治家的一個最嚴峻的挑戰。歷史的機會不常有，如果我們不去認識它、抓住它、珍惜它，機會也就一去難回了。

無論中國現在還多麼窮，如果與 40 年前相比，中國人民正處在一個新的出發點，一個大發展的前夜。我們現在已經能年產 10 億噸煤、6000 萬噸鋼鐵，那就是說現在一年的工業產值比 50 年代 10 年還多。中國不是沒有問題，中國政府不是沒有犯過錯誤，但是如果把中國的形勢扭曲為已經到了“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那是很難服人的。中國今天的困難是前進中的困難。中國人民完全有希望在 90 年代干得比過去更好。

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在過去的 40 年中摔了很多跟頭。如果我們能正確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它就會變成一筆巨大的財富。我們中華民族雖然古老，但是對如何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却没有經驗，不但人民没有經驗，國家領導人也缺乏經驗。改革是“踩着石頭過河”，弄不好就會出亂子。這次動亂給國家以及學生運動的參加者帶來了難以彌補的損失，當然它更不會給那些政治“精英”們帶來他們期待中的任何好處。

今後的三四十年對於中國至關重要。中國亟需迅速強大起來，才能從容面對各種無法完全預測的風險和挑戰。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需要迅速得到提高。而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在於保持政治上的基

本穩定。一切政治和經濟的改革都有必要在保持政治基本穩定的前提下進行。如果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能把他們智慧集中到這樣一個政治共識上——竭盡全力去改善而不是去推翻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從而避免一場代價巨大的動亂發生，那麼，中國將來的發展無疑是大有希望的。

與此相反，如果中國的知識分子轉而接受推翻現政權、重建資本主義的種種政治設計，那麼中國的將來就有可能為一些或大或小的動亂所困擾，而無法把力量集中到經濟建設上去，甚而重新出現上半個世紀那種戰亂頻仍的不幸局面。退一萬步說，即使是現時這一批以“民主鬥士”自譽的政治“精英”們在一場大動亂後有機會上台組織政府，推行他們那一套恢復私有制的“救國方案”，他們也必然會被種種經濟的、政治的以及社會的問題所困擾，而無力追回一場可能包括內戰在內的大動亂所造成的損失。現時的政治“精英”們大多是一些自以為西化了的文人，根本不了解中國的國情，又缺乏實際的社會生活的知識。也許正因為這樣，他們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不惜進行政治冒險，把學潮引到與國家機器正面衝突的死胡同。

對那些認為不在中國復闢資本主義中國就沒有前途的政治“精英”來說，打倒中國共產黨和推翻中國政府就成為實行任何政治變革的前提條件。他們的政治目標是明確的，那就是要推翻現存的國家機器，或者用學生們的生命去“喚醒民衆”。學生只不

過是實現他們政治目標的物質力量。他們與現政權之間的衝突自然無法調和。學生們的悲劇在於，他們並不願意接受推翻共產黨、重建資本主義的政治綱領，但又無力掙脫政治“精英”們的控制，從而造成了有違初衷的後果。他們的政治目標應該而且可以通過對社會主義制度的逐步完善來實現。中國需要建設性的、理性的、沉穩現實的、精明全面的思想和行動，我們亟需減少破壞性的、膚淺的、浮躁浪漫的、輕率片面的臆斷和盲動。中國經歷的大動亂已經太多，中國不需要一場新的大動亂。這應當是每一個愛國者從當前的反思中所達到一個最重要的共識。

二.社會主義在中國已經失敗了嗎？

主張在中國重建資本主義的人早就提出過一個論點：社會主義在中國已經徹底失敗。他們有時為中國的前途焦慮不安，也是建立在這樣一個武斷的基礎上。如果說這個論點是一個大膽的假設，那麼小心求證的文章却幾乎沒有見到。開放使許多年輕人第一次看到東西方之間的幾乎令人難以忍受的巨大差距，但在驚訝、羞愧之餘，却很少有人認真地分析差距的由來。在這種非歷史的情緒支配之下，社會主義制度便成了替罪羔羊，似乎一旦資本主義重新確立，問題便馬上可以得到解決。的確，如果社會主義已經，或者說從來就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桎梏，它的存在價值早就丟光了。好在社會主義在

蘇聯和中國分別有了幾十年的實踐，這個問題已經可以用實際數字來回答，而不致陷入爭而不決的理論漩渦之中。

我們先來看看蘇聯的情況。爲了不使結論跟着感覺走，有必要橫看、豎看歷史。一旦明白社會主義首先是在比較貧窮的國家，或者如列寧所說在帝國主義鏈條比較薄弱的環節建立起來，這個問題本沒有爭論的必要。蘇聯是最老的社會主義國家，它的國力仍然與美國有相當的差距。據台灣當局公布的數字，1985年美蘇兩國的人均總值分別爲14090和6350美元，蘇聯只及美國的1/2。可是，如果考慮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1914年，俄國與美國相應數字的比值大約是1/8，我們就不能在整體上說社會主義使蘇聯的經濟發展緩慢和停滯不前。十月革命前，俄國一直是歐洲列強中生產力最落後的。它在1910年生產300萬噸生鐵和2500萬噸煤，大大低於英國的1000萬噸和2.7億噸，德國的1500萬噸和1.5億噸，更不必提美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革命後的內戰嚴重損傷了蘇俄的經濟，使它在1928年才恢復到1913年的水平。從1928年到1938年的10年中，蘇聯進行了兩個五年計劃，蘇聯與美國的人均工業水平迅速地從1:8縮小爲1:4。蘇聯在1926至1938年的12年間，製造業產量增加了7倍半以上，其發展速度之快是令人震驚的。與此同時，美國的經濟却處於“大蕭條”時期，它用了整整10年的時間才返回到

1929 年的水平，其部分原因還得益於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現在的年輕人幾乎沒有人知道蘇聯人在當時所創造的世界經濟史中的一個奇跡。一位西方學者最近對此評論說：當時蘇聯“製造業產量與國民收入的增長之快——即使人們採用更為小心的估計——在工業化的歷史中的確是沒有先例的”。不論斯大林在那時干了多少錯誤的事，蘇聯在 30 年代的大發展是一個基本的事實。如果沒有這個大發展，很難想象蘇軍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取得反對德國法西斯的決定性勝利。到了 1950 年，蘇聯的經濟實力已達到英、法兩國的總和而接近美國的 $1/3$ 。兩個超級大國的局面遂告出現。蘇聯的經濟發展遲緩發生於 70 年代即勃列日涅夫領導的後期。蘇聯的經濟、特別是它的農業存在着嚴重的困難。它的困難部分來源於多年龐大的軍費開支。現在，蘇聯人民正在進行改革，他們究竟能不能擺脫眼前的困難，我們不妨拭目以待。但是社會主義使蘇聯從一個不發達的國家步入一個工業化了的國家，顯然是無需爭辯的事實。美國的經濟也不是沒有問題，別的都不說，請看一看美國政府的赤字和債務。1985 年美國政府的赤字達到 2028 億美元，目前的國債已近 3 萬億美元。如果這個趨勢不扭轉，到了 2000 年美國國債有可能高達 13 萬億美元，一年要償還的利息將為 15000 億美元。美國的貧富差別在發達的工業國家中是最大的。美國社會中最貧窮的 $1/3$ 甚至沒有多大興趣行使他們的投

票權。資本主義在這世界上確立至少有 300 餘年了，它至今仍在克服它的危機與困難中向前發展着。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科學與技術的迅速發展使整個世界的經濟增長速度有加快的趨勢。階級結構的某些變化以及人民生活平均水平的提高，緩解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許多矛盾。社會主義來到世間才幾十年，它帶着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社會理想與敵視它的資本主義鬥爭着、發展着。有誰能夠證明社會主義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呢？

我們再來討論中國的情況，看看社會主義究竟能不能救中國。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它在 1952 年的工業發展水平實際上低於英國的 1860 年，德國的 1890 年，接近俄國的 1910 年。我國在 1952 年僅能生產鋼 135 萬噸，而日本在 1938 年已達到 700 萬噸。弄清楚我們的出發點是非常重要的。恩格斯在 1845 年發表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把英國工人當時悲慘的生活如實地反映出來。如果按人口平均，我國在 1952 年的工業水平頂多只及英國的工業革命時期，即 18 世紀的後期。這是令每一個炎黃子孫都無地自容的難堪局面，然而它却是無法回避的事實。這樣的一個水平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如果回過頭來搞資本主義，必然重現恩格斯所描述過的那種悲慘景象。

在那些從來沒有忍饑挨餓的青年學生，以及那些也許並沒有惡意地却在竭力否定我國經濟發展成

果的青年們的導師中，恐怕沒有幾個清楚地認識到新中國的出發點在哪裏，有的人甚至忘記了自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的侵略給人民帶來的苦難。有的人非常羨慕西歐、北歐、北美已經高度發展了的物質文明，而往往不懂得人家是在二三百年的時間裏逐步完成的，其中包括血腥的殖民掠奪和非正義的戰爭。所以，如果要想對中國 40 年經濟發展的成果作出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我們有必要知道共和國的出發點在哪裏。共和國的出發點即使在第三世界國家也要算差的，比如說印度在 1914 年已經有鐵路 5 萬多公裏，而我國在 1949 年僅有 2.2 萬公裏。由世界銀行提供的數字表明，中國的發展速度不僅高於我們的鄰國印度，也高於其他發展中國的平均水平。我國在 1963—1984 年間發展速度一般要比印度高 2 到 3 個百分點。而印度的發展速度也並不太差，它在 1980—1985 年間比台灣與日本的發展速度還稍快。讓我們再來看看印度與中國的工業發展情況。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的數字說明，中國的工業生產在 1965—1984 年的 20 年間平均增長速度高於印度 8 個百分點，即使是在“文革”發生的 10 年困難局面下，它的增長率也是接近 10% 而大大高於印度的不足 4%。因此，只要我們稍有耐心研究一下外國人對中國經濟發展所作的估計，我們都沒有理由說中國的社會主義已經失敗。由世界銀行提供的統計數字還表明，在 1950—1978 年間，除日本以外的其他工業化國家的總值一般增加